

A STUDY ON ADMISSION SYSTEM OF
THE UNIVERSITIE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抗战时期的 民国大学招生研究

姜闽虹 著

本著作作为2010年北京市教委教改立项阶段性成果

项目编号为PXM2010_014208_098201

A STUDY ON ADMISSION SYSTEM OF
THE UNIVERSITIE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抗战时期的 民国大学招生研究

姜闽虹 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抗战时期的民国大学招生研究 / 姜闽虹著.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 - 7 - 5682 - 3147 - 3

I. ①抗… II. ①姜… III. ①高等学校 - 招生 - 研究 - 中国 - 1937 ~ 1945
IV. ①G649. 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25726 号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 68914775 (总编室)

(010) 82562903 (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010) 68948351 (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 16.75

字 数 / 353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59.00 元

责任编辑 / 梁铜华

文案编辑 / 梁铜华

责任校对 / 周瑞红

责任印制 / 王美丽

前言

历经8年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卫国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抗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高等教育机关狂轰滥炸，使各高校的校舍、仪器、图书损失惨重。中国经济较为发达的东南沿海、沿江一带，以及平津两地的高校首当其冲，最先遭到破坏。在教育部的有关指令下，这些地区的高校集体向西南、西北地区转移。据统计，由于日寇的疯狂侵略，当时全国108所高校，有10多所因战争影响而停闭，70多所先后被迫迁址，踏上了向大后方转移的艰辛之路。在漫漫西迁路上，留下了中国大学生们的沉重足迹——浙江大学的“文军长征”，西南联合大学撤退至昆明，都是这一时期大学西迁的著名事例。这使得中国经过多年发展形成的高等教育资源得以保存，并促使中国高等院校的分布区域更加合理，促进了西北、西南高等教育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同时，先进的科学技术、思想文化在新的时空条件下得以扩散和传播，而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长期封闭、发展停滞的状态也得以全面改变。

抗战期间，重庆国民政府对高等教育十分重视，不断推进教育改革。通过实施国立（公立）院校统一招生政策，开办大学先修班、补习班等收容高中毕业生，并在大学教育布局上采取增设国立大学、省立大学，将部分私立大学改为国立，开办师范学院和专科学校等一系列措施，一批新的大学和专科学校如雨后繁星般地出现，中国的大学在遭受战争初期的重大损失之后很快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等5所国立大学，就是在西北联合大学的基础上创设的。诸如中正大学、英士大学，以及国立师范学院、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国立中央技艺专科学校等，都是在这—时期诞生的。虽然如今这些大学、独立学院、专科学校等不复存在，但在抗战时期，确实为中国的抗战和未来的建设培养了无数的人才——历史绝不会忘记他们。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许多国家的高等教育陷于瘫痪，而中国的高等教育不但没有因为弥漫的战火而中断，反而实现了一次跨越式的发展，创造出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和巨大的创造力！抗战胜利之时，中国的大学数量由战前的108所增至1945年的141所；在校生数量在抗战期间也不降反升，由1936年的4万余人，增至1945年的8万余人。以浙江大学、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战时高校的发展，为战时高等教育的稳定和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也为抗战及战后重建培养了大批人才。

本人在近年来开始接触到民国早期和抗战时期的一些教育史料，对这些已经远去的大学和学人产生了深深的崇敬之感，因此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便开始动笔撰写这部著作，希望以抗战时期的大学招生为切入点，描述中国大学在抗战

时期的发展历史；通过对搜集到的大量抗战时期一手材料的整理、研究，探讨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成功经验。整理资料的过程，也同抗战时期高校大迁徙一样充满了艰辛，但随着资料整理工作的深入，抗战时期大学招生的发展脉络和中国各大学的发展历程也逐渐清晰起来。

我们认为，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以及战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高等院校的招生考试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重庆政府根据时局的需要，对国立大学招生考试政策做出及时调整，也使抗战前后的大学招生政策呈现出历史的差异。从之前的各大学自行招生逐渐演变为教育部统一组织招生考试，最后发展为多元化招生考试。在描述这一发展时，本著述将其划分为统一招生时期（1938—1940年），联合招生和分区招生时期（1941—1942年），以及招生多样化时期（1943—1945年）3部分。实际上，在8年抗战中，大学招生最精彩的是统一招生时期：先是国立大学和独立学院的统一招生（不包括上海的国立大学、独立学院），然后逐渐扩展至所有的国立大学（学院）和省立大学的统一招生，最终扩大到所有公立的大学和独立学院统一招生。重庆政府教育部原本设想在全国范围内都实现统一招生的，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但是由于战争日益残酷，交通阻隔，统一招生难以实施，不得不开启了联合招生和多样化招生的新模式。在统一招生过程中，重庆政府教育部表现出惊人的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基本确立了自己在中国高等教育中的权威地位；而其在招生考试的规范化方面做出的积极探索，也深刻地影响到此后的大学教育和中等教育等。

本著述是本人继《民国时期的高等学校招生研究》（1912—1937年）之后的又一部专著。从时代延续来说，两部著作可互为补充。我们希望读者通过阅读此著述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这一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同时也不妄自菲薄地看待我们今天的高等教育的发展。我们也希望同样关注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研究的专家和学者提出宝贵意见，共同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进行。

姜闽虹

2016年6月16日

目 录

第一部分	统一招生时期（1938—1940 年）	001
第一节	流亡与西迁	001
第二节	战时临时大学	009
第三节	1938 年的国立院校统一招生	029
第四节	1939 年“全国一张卷”的国立院校统一招生	052
第五节	1940 年稳步推进的公立院校统一招生	078
第二部分	联合招生和分区招生时期（1941—1942 年）	111
第一节	1941 年的自行招生与联合招生	111
第二节	第二次“大学大迁徙”中的岭南大学	137
第三节	司徒雷登先生与燕京大学的内迁	142
第四节	上海孤岛的大学迁移	148
第五节	汪伪政府控制下的大学	167
第六节	1942 年的分区招生和委托招生	182
第三部分	招生多样化时期（1943—1945 年）	195
第一节	1943 年的多样化招生	195
第二节	知识青年从军运动	217
第三节	1944 年的持续扩大招生	233
第四节	1945 年的区域联合招生	247

第一部分 统一招生时期 (1938—1940年)



第一节 流亡与西迁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在卢沟桥挑起的事变，标志着中华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开始。1937年7月28日上午，日军向北平发动总攻，北平沦陷。30日，天津失守。1937年8月13日，日寇向上海大举进攻，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在日寇铁蹄的践踏下，中国大片国土沦陷，山河破碎，生灵涂炭，流离失所，战区的高等学校随同当地政府等不得不开始迁徙至后方办学的征程。

平津沦陷之后，北京、天津的大学生们开始向暂时安全的地方撤退。1937年8月16日，北大、辅仁、清华等校学生300余人，由天津乘船经山东龙口抵达济南，“备极困苦”^①。这是逃到济南的第一批学生。此后又有200余人逃到山东。这些逃离平津的大学生，包括一些外省到京参加大学招生考试的高中学生等，大多为河北、河南、山西，江浙、两广以及东北各省的学生。逃亡学生先乘坐北宁线火车到天津，又转乘英国轮船公司的轮船到山东烟台龙口。在龙口乘坐汽车到山东潍县，然后乘坐胶济线火车到达济南。一路上皆是难民。“沿路情形极惨，车上武装日兵随时检查，气焰万丈”。据这些逃难的学生讲，平津失陷之后，情形极为危险。大学生们不得不冒险外逃。在逃难路途中，亲眼看见河北廊坊黄土坡一带“已成一片瓦砾”。“铁路两旁行将成熟之农作物，日军防有我军潜伏，均强迫民众刈除”。到达天津后，他们进入租界内：在英租界内有“世界红十字会与开滦煤矿公司合组之招待所，对难民供给食宿，及少数路费”；“有人华界者，则须经日军之彻底检查”^②。平津逃难学生到达济南后，由山东省

^① 《平津学生由津到济》，《申报》上海版1937年8月16日，第6版。

^② 《平男女生五百余人逃济谒韩》，《教育杂志》第27卷第9，10期，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六年十月十日出版，第136页。

教育厅安排到育英高级中学、第一中学住宿。学生们推举代表3人面见韩复榘，请求救济。此后，这些逃亡至济南的学生，一部分南下至南京，一部分来到上海，而其余的300余人乘坐铁路部门派的一列专车到了徐州。到达徐州的这些学生被分为4路返回家乡：一路到江南；二路经郑州赴汉、粤；三路赴西安；四路赴保定、太原^①。

来到南京的平津流亡学生有300余人，集中在南京第二中学，“一日两餐，暂由教部指定供给，此外一切均须自备”。这些流亡学生，由于战争的缘故，仓皇逃离，所以行李、衣物等甚是缺乏。“当各生离开平津时，气候尚热，均未携带行李，现届秋凉，既无衣服御凉，更无被毡遮体，日聚宿舍，夜卧便床，生活凄惨”。南京各界人士，看到平津学生的凄惨情形，无不生恻隐之心，希望教育部能够动用各国退回庚款来救济平津学生。国难当头，学生流离失学，生活没有着落，国民政府教育部也立即拟定了针对学生的救济办法。其中，关于平津留京高、初中学生安插办法有3项：

(1) 高中毕业生，可投考长沙、西安各临时大学，或投考其他大学与专科学校之可收容新生者。初中毕业生可径向各高中投考。

(2) 考取后须有原校或其他相当证明文件，方得入学。

(3) 对于高、初中未毕业学生，教育部发给其借读介绍书，通过测验之后，将其编入相当年级借读。

这几条处置办法，实际上只是给流亡学生一个继续学业的通融办法，并不能解决流亡学生的生活困境^②。

平津流亡学生中，还有一批80余人返回到陕西。这些学生大多是陕西籍学生。返陕的80余人中，有20多人回了自己的家，而其余60余人被当局安置在西安北大街的二中校内^③。

日寇侵入北平后，占据了各大学，并成立了7所实施奴化教育的敌伪学校。其中由新民会创办的新民学校，占据了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校址，“其后又将一部分迁入清华”。在原师大校址上，建立了师范学院。此外，还在师大校址上设立了一个师资讲肄馆，被分为中、小学两部。训练3个月之后，将其派出到各中、小学实施奴化教育。日寇还在北大校址上重组了一个“北京大学”，设文、理两科。此外，还在北平大学农学院、医学院校址上设立农学院、医学院，隶属于伪北京大学^④。

除此之外，日寇对北平城内各大学之图书、仪器、校舍进行大肆破坏。清华、北大、东大、平大等各国立大学被破坏得最严重。清华大学的机器、仪器、图书“咸被

① 《平津大学生由徐遣散回籍》，《教育杂志》第27卷第9，10期，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六年十月十日出版，第136页。

② 《平津流亡学生到京处置办法》，《申报》上海版1937年9月10日，第2版。

③ 《留平津学生一部返陕》，《教育杂志》第27卷第9，10期，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六年十月十日出版，第136页。

④ 《今日之华北》（三），《申报》上海版1938年12月24日，第7版。

盗毁”，体育馆也遭到毁坏。北大研究院的珍贵文物荡然无存，第三院也被伪警官学校占用。偌大的国民政府之文化教育中心——北平城，当时拥有14所专科以上的学校^①。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迁移后方。北京城内维持上课的大学只有中法大学、北平协和医学院、辅仁大学、燕京大学等校，但是各校教授也多离去，学生人数锐减。在校师生只能埋头读书，避免聚会，朝夕自危，时觉风声鹤唳，“不复有当年弦诵之盛”^②。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的前身，是创始于清代光绪二十八年京师大学堂之附设师范馆，此后历经变更，至民国十八年八月，奉令独立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民国二十年七月，奉令与国立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合组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分设教育、文、理3个学院，将前女子师范学院附设之研究所改为研究院，并将附属中、小学及蒙养园分别改名，直隶该校。直至“七七事变”前，全校图书近12万册，价值近18.6万元，仪器、标本、模型、机器等共计价值近30万元，全校校产价值在百万元以上。1937年7月28日，北平失陷，8月中日寇先占驻该校教育学院、理学院，8月末又占驻文学院。“教职员及学生纷纷移徙。职员偶在校门外大街观望，校工偶尔叹息，即遭逮捕绑缚，欲予枪毙，几经交涉，始得释放。对于校中什物，任意破坏，或生火炊饭，或遗弃满地，并运走物理系无线电机。即学生私人书籍、行李之存置学校库房者，亦多毁弃无余。校长李云亭因鉴于失去国军保障，无法行使职权，遂率员工迁往内地”^③。

北平遭日寇大肆劫掠破坏，而上海在“八一三”之后亦未能幸免。数所大学惨遭敌机轰炸，图书、仪器、设备几乎被破坏殆尽。据载，遭受日寇轰炸的大学，有暨南大学、同济大学、大夏大学、沪江大学等。

1937年8月19日下午6时许，日机飞到上海西郊真如镇暨南大学上空，投下多枚炸弹。暨南大学的大礼堂及中学部校舍全部被炸毁。暨南大学的科学馆一部分被炸毁，一名学生罹难，一名校工受伤^④。

9月7日，6架日寇军机飞至沪西上空一带侦察，向位于中山路的大夏大学投下数枚炸弹。大学的大门口附近数处房屋被炸毁。幸好该校学生等早已迁移，所以没有发生伤人事件。

国立同济大学校址设在吴淞。“八一三”淞沪战事打响之后，日寇军机在同济大学上空“迭加侦察，冀图破坏”。8月28日和29日两日，“竟日以飞机掷弹轰炸，该校所有建筑现几悉遭破坏，尤以大礼堂、实习工厂、学生宿舍及理学院等项工程宏大之

① 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5编《高等教育》，第1章《概述》，第525页，商务印书馆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出版。

② 《今日之华北》（三），《申报》上海版1938年12月24日，第7版。

③ 《艰苦奋斗之北师大》，《申报》上海版1938年11月11日，第12版。

④ 《暨大被炸，死一学生》，《申报》上海版1937年8月20日，第2版；《抗战开始后被敌摧毁之学府》，《教育杂志》第27卷第9、10期，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六年十月十日出版，第134—135页。

建筑破坏殆尽”。“他如尚未完工之测量馆等，亦遭炸毁”^①。

设于江湾的复旦大学，校舍被日寇炸得也十分严重。其中，体育馆全部被毁，子彬院（科学馆）及3座宿舍都受损严重^②。

另据报道，位于杨树浦的沪江大学，也为“敌机和炮弹所炸毁。闻该校等所有图书、仪器、建筑，一概破坏殆尽”^③。

在这些被日寇炸毁的大学中，暨南大学位于上海真如，已在当时上海的郊区；同济大学在吴淞镇北，亦在当时之上海郊区；而位于江湾的复旦大学，位于杨树浦的沪江大学，以及位于中山路的大夏大学，则在当时上海的中心地带和北部。这些地区，历来是文化机关聚集之地。由此可以看出，日寇毁灭我大学的行为确实是蓄意为之。

上海专科以上学校共计24所^④。淞沪抗战之后，同济大学全部及复旦大学一部迁徙浙、赣、桂、川、黔。其余大学虽未撤离上海，但也无法在原校址上课，先后在上海英、法租界复课。国立交通大学的学生在位于吕班路的震旦大学及爱麦虞限路的中华学艺社上课。暨南大学的学生在位于爱多亚路的暨南大学附中及重庆路与威海卫路口的新寰职业中学上课。上海商学院的学生在愚园路40号上课。上海医学院的学生在海格路363号上课。中法工学院的学生在辣斐德路1195号上课。音乐专校的学生在台拉斯脱路217弄5号上课。大同大学的学生在位于爱多亚路的无线电工程学校及福熙路与慕尔鸣路口的光夏中学上课。大夏大学的学生在位于静安寺与路戈登路口的弘毅中学内上课。光华大学的学生在位于汉口路的国信银行大楼上课。复旦大学的学生在位于仁记路的中孚银行3楼上课。沪江大学的学生在圆明园路209号上课。其中，理科生实验课在大陆商场大楼上课。震旦大学的学生在吕班路225号上课。东吴大学的学生在大陆商场大楼上课（法学院的学生在位于虞洽卿路的慕尔堂上课）。上海法政学院的学生在辣斐德路1477号上课。上海法学院的学生在大通路的爱文义路口上课。持志学院的学生在位于赫德路的振粹小学上课。东南医学院的学生在萨坡赛路295号上课。同德医学院的学生在同孚路67弄1号上课。正风文学院的学生在位于爱文义路的道中中学上课。上海美术专校的学生在菜市路上课。东亚体专的学生在位于华龙路的职业教育社上课。新华艺专的学生在薛华立路薛华坊15号上课。总计有22所专科以上大学，拥挤在英、法租界内——这也算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地域，给大学生们一个相对安静的学习场所。除了上海的20余所大学，江浙地区的3所大学也迁到了上海，其中有之江文理学院、南通学院、苏州美专等。此外，除了已在教育部立案的大学，当时上

① 《敌军蓄意破坏文化机关，同济大学被毁》，《申报》上海版1937年9月3日，第1版。

② 《抗战开始后被敌摧毁之学府》，《教育杂志》第27卷第9、10期，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六年十月十日出版，第134-135页。

③ 《上海两大学被敌机炸毁》，《江西地方教育》，第91、92期合刊，第45页，江西省教育厅编印，民国二十六年九月十一日出版。

④ 《上海高等教育现状》，《申报》上海版1938年10月21日，第13版。

海还有一些未立案的大学，如圣约翰大学（1947年10月在教育部立案）等，还有新设立的一些大学，总计40多所大学在艰难坎坷中步履维艰地维持^①。

设于广东的中山大学被日寇飞机炸毁之后，校长邹鲁曾发表书面谈话，谴责日寇炸毁中国各大学。其中列举被日寇炸毁的大学中，就有中山大学、天津南开大学、河北女师、河北工学院、中央大学等^②。

众多的大学校舍被炸毁，仪器、设备、图书等尽皆被毁。学生们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开始向后方转徙，开始颠沛流离的求学之路。但是，中国之大，仍然没有一个能够放下一张课桌的安全之地。不少教职员和学生迁徙办学的艰难困苦之中，丧生于日寇的轰炸和刺刀之下。

“八一三”淞沪会战之后，江浙一带的大学也开始了艰难的西迁办学之路。其中，最为艰苦的是号称“文军长征”（比肩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浙江大学的西迁办学历程^③。

国民政府时期的国立浙江大学，设在原杭州求是书院的旧址上。该大学设文理学院、工学院、农学院，以及浙江省政府委托代办之浙江省立杭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及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大学本部设在大学路求是书院的旧址上（据文献资料，此大学路自里横河桥直街至庆春门直街，原名蒲场巷。浙江大学迁校之后，市府拓宽路面，此后改名大学路）。浙大之工学院设在求是桥，原铜元局旧址上，也就是报国寺。当时“四面土山环绕，梅林广植，桃李争芳”^④。工学院的东边，有以前的军械库，当时也被划归浙江大学所用。求是桥的旁边是孟邻堤。浙江大学在此设立了健身房与游泳池。浙江大学农学院原址在杭州的笕桥。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时，中央航空学校要扩充，“商请价让”，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求买下农学院这块地。中央航空学校事关国防大事，农学院自然不会拒绝，于是用这块地置换太平门外华家池1000多亩^⑤地，辟为农学院新校舍。新建的校舍“秀丽辉煌”，当时也算是比较豪华的。此外，浙江大学的校产，还有西湖罗苑（即哈同花园）、湘湖农场和凤凰山林场。西湖罗苑后来被借给了新成立的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而湘湖农场和凤凰山林场，“一则风景清幽，建筑宏丽，一则幅员广大，物产丰饶”^⑥。湘湖农场约有万亩之大，已开垦的熟地有3000多亩，林场有1000多亩，校舍面积也有1800多亩^⑦。也就是说，当时的浙大的校产，

① 《上海高等教育现状》，《申报》上海版1938年10月21日，第13版。

② 《中山大学被炸毁，邹鲁发表书面谈话》，《申报》上海版1937年10月5日，第4版。

③ 彭真同志为浙江大学题词：红军长征是“武军”长征，浙大西迁是“文军”长征，都是历史上的创举。

④ 孙祥治：《浙大历史的回顾》，《浙大学生》复刊第2期，第31-32页，浙江大学《浙大学生》编委会民国三十年九月编印。

⑤ 1亩=666.67平方米。

⑥ 同④。

⑦ 孙祥治：《抗战以来的国立浙江大学》，《浙大学生》复刊第2期，第33-38页，浙江大学《浙大学生》编委会民国三十年九月编印。

有13 000亩地之多。因为浙江大学是浙江成立的第一所大学，省政府自然给予大力的支持，再加上浙大蒋梦麟、竺可桢等校长的不断努力，才成就了浙江大学当时的宏大规模。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之后，杭州一带成为空战的主战场之一。日寇军机的不断袭扰，极大地威胁着杭州市民和浙江大学师生的生命安全。战事在不断扩大，战火在渐渐逼近杭州湾，和平不再，必须考虑学校下一步的办学校址。有鉴于此，浙江大学开始实施异地办学的计划。一方面是从学生的安全考虑，另一方面是浙江大学学生人数不断增加，校舍确实不够使用，再加上“实施导师制之关系”，于是在西天目山设置了一所浙江大学的分校。1937年秋季入学的一年级新生，就在这里读书上课。一年级的新生于当年9月23日自杭迁往，租借西天目山上的禅源寺上课。“其间环境清幽，又免于空袭之警，故教学训导效率更佳”^①。

留在杭州继续开课的浙江大学二、三、四年级学生，“虽在敌机频炸屡袭之下，坚苦维持，不做他徙之计，凡历三阅月之久”。在此期间，浙江大学成立了特种教育委员会，由一些教授分组进行非常时期的教育和防护训练。学校还组织了后方服务队，使学生在其中受到军事和后方勤务的训练（在此之前，全国的高等学校等都已经开始了军事训练。各大学中均派驻有军训教官）。

1937年11月初，日寇在金山卫、全公亭登陆，“疾向沪杭路推进，杭垣震动，迁避纷纷”。杭州已经无法安身，浙江大学不得已开始迁徙。令谁都不会想到的是，这只是万里迁徙的开始。

浙江大学首先将迁徙地点确定为浙江的建德。浙江建德位于杭州之西南方向150公里^②左右，历史上曾被称作严州，地处浙西丘陵山地和金衢盆地毗连处。山地和丘陵占其总面积的88.6%，交通不甚方便。因为日寇迫近，情形紧急，全校师生自11月11日起，到13日止，编成数队，乘船溯钱塘江南驶。因为浙江大学早做准备，在此租赁了房舍（“租民房，假公舍”）^③，17日即开始上课。在此期间，在西天目山上课的一年级学生，亦因日寇迫近，沿天目溪向建德撤退，与本部会合，此后借省立严州中学地上课^④。

浙江大学当时有图书仪器2 000余箱，重200多吨，运输起来非常不容易，再加上战争的缘故，交通阻隔，“虽竭数朝夕之力，终不过辇其半”。一直到12月24日杭州

① 《浙江大学迁校略记》，《国命旬刊》1938年第7期，第16-17页，浙江大学《国命旬刊》编辑委员会民国二十七年六月十日出版。

② 1公里=1 000米。

③ 孙祥治：《抗战以来的国立浙江大学》，《浙大学生》复刊第2期，第33-38页，浙江大学《浙大学生》编委会民国三十年九月编印。

④ 《浙江大学迁校略记》，《国命旬刊》1938年第7期，第16-17页，浙江大学《国命旬刊》编辑委员会民国二十七年六月十日出版。

沦陷前一天，“运输之事亦未尝中辍”^①。

浙江大学在建德上课有7周的时间。期间杭州、富阳相继沦陷，建德已不再为安全之地，于是奉令西迁至赣南之吉安、泰和。12月25日，浙大师生分批自建德出发，“遵信安江绕兰溪以至金华”，准备从金华乘坐火车西行。12月26日，日寇军机轰炸金华，“一部分师生几遭不测”，情势十分危险。浙赣线上的火车，因为军运繁忙，旅客列车经常受阻，于是转徙途中的师生，不得不放弃原有计划，“乃多冒风雪步行，赴衢州，转常山，而集中于玉山”。金华距衢州100公里左右，衢州距常山40公里左右，常山至玉山40公里左右，全程180公里左右，路险难行。可以想见，浙江大学的师生冒着风雪，步履维艰地行走在山道上，需要多么坚强的意志和拼搏的精神！一直到1938年的1月8日，最后一批人员和图书、仪器才到达了玉山。李絜非在述及浙大西迁途中从玉山至樟树镇，最终到达吉安的行程时说：

（1月）8日起，我们和浙赣路接洽好了的客车，开始拖运我们和图仪，遂分批地向西出发。沿途时有羁阻，10日后（18日），最末一批的男女同学方才到达樟树镇，而以前抵樟的几批教职员、学生和工友，已是陆续地前赴吉安。27日，断后的一批图仪船只到了吉安^②。

玉山至樟树有三四百公里之遥。由于道路阻滞，车行缓慢，一些学生竟然走了10天的时间才到达^③。

从建德迁至赣南之浙大师生，终于在1938年1月底全部会齐于吉安。七八百公里的长途转徙，山路崎岖，道路险阻，“风尘经月，艰苦备尝”，这大概是浙江大学西迁途中最为艰难的一段时期^④。

浙江大学迁到江西吉安之后，江西省政府原定暂借白鹭洲的吉安中学为浙江大学迁赣后的临时校舍，但是由于一些原因，未能商妥。于是，浙江大学开始筹备泰和的临时校舍。浙江大学在泰和的临时校舍，设于泰和南之上田村，“假大原书院及其附近民房，修葺以充校舍”。在校舍修葺期间，暂借正在放寒假的白鹭洲之吉安中学和乡村师范两校校舍上课，并在此结束了浙江大学该学年第一学期课程。1938年2月，浙江大学迁往泰和^⑤。泰和距吉安40公里，且有可通行汽车之省级道路，迁行十分顺利。3

① 《浙江大学迁校略记》，《国命旬刊》1938年第7期，第16-17页，浙江大学《国命旬刊》编辑委员会民国二十七年六月十日出版。

② 李絜非：《抗战中浙江大学》（续完），《教育通讯》第22期，第12-14页，教育通讯周刊社（汉口中山路积庆42号）民国二十七年八月二十日出版。

③ 《浙江大学迁校略记》，《国命旬刊》1938年第7期，第16-17页，浙江大学《国命旬刊》编辑委员会民国二十七年六月十日出版。

④ 同上。

⑤ 《浙江大学迁校略记》记为1月13日。李絜非《抗战中的浙江大学》（续完）亦曰：“自一月十三日起的一周间，迁至泰和，此一周即作为二十六年度的寒假。”浙江大学校史馆认为，迁至泰和的时间为2月。

日之间，已经完成所有搬迁工作，不久即开始上课^①。此后，浙江大学在泰和度过了将近8个月的和平的读书生活，一直到1938年8月30日才迁往广西宜山。

1938年5—6月，江西省境内的战事也已经非常紧张。浙江大学奉令再次西迁。竺可桢校长和胡刚复院长于7月间经武汉转道湖南，入广西，勘察校址。经过与广西、贵州两省的接洽和商谈，最终决定迁校宜山，并开始组织迁校委员会开展迁校各项准备工作。

据《申报》所载，浙江大学奉令西迁，“原指定以黔省安顺为临时校址所在地”，但因江西、贵州两地“相去甚远”，而且2000多箱的图书、仪器运输也十分艰难，“抑更费时”。“当承广西省地方人士之欢迎，即暂中止于该省之宜山，以期撙节国帑，而谋及早复课”^②。也就是说，浙江大学原定之迁徙地乃贵州安顺，但最终落脚在广西宜山的原因，除了图书、仪器的运输不便外，还有当地政府和民众的热情款留。

8月中旬，浙江大学派出先遣人员前往广西宜山修葺校舍。其后，图书、仪器开始被运输。8月30日，浙江大学教师开始分批迁往宜山。9月15日，学生开始分批迁往宜山。10月中旬，全体师生全部抵达宜山，校舍也逐渐布置就绪，于是按照教育部的指令，于11月1日开始了宜山新校的课程^③。

浙江大学在广西宜山临时校址上课有一年多的时间。1939年11月24日南宁失陷，“宜山空袭警报几于无日无之，甚且整日不懈。全校师生皆日在出避警报之中。其荒时废业，于教学之损失，将有不堪设想者在”^④。浙江大学于是不得不开始做第四次迁徙。1940年4月25日的上海《申报》记载此次迁徙说：

该校一面仍在宜山维持课业，一面派员入黔筹备临时校舍……至本年初，该校由迁校委员会主持，开始北移。分别于沿途设站，运送员工图（书）仪（器），复承黔省地方当局及交通各界之赞助，迁移事宜得以于最近期间告一段落……该校廿九年度新收一年级及先修班学生四百余人，已于二月八日在筑南青岩临时校址复课；二、三、四年级学生五百余人，则亦于四月二十二日在遵义临时校址复课^⑤。

两地办学自然有许多不便，浙江大学于是开始筹划新的校址，最终确定在湄潭建设能够较为长期使用的校舍^⑥。有贵州学者记述浙江大学在贵州遵义办学时曰：

……民国二十九年春始抵贵州之遵义，而别置一年级于青岩，既以理、农二院处

① 《浙江大学迁校略记》，《国命旬刊》1938年第7期，第16—17页，浙江大学《国命旬刊》编辑委员会民国二十七年六月十日出版。

② 《浙江大学由桂迁黔，在遵义复课，现设五学院》，《申报》上海版1940年4月25日，第7版。

③ 《本校迁宜山经过纪略》，《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1期，第2页，民国二十七年十二月五日印行。

④ 《浙江大学由桂迁黔，在遵义复课，现设五学院》，《申报》上海版1940年4月25日，第7版。

⑤ 同上。

⑥ 孙祥治：《抗战以来的国立浙江大学》，《浙大学生》复刊第2期，第33—38页，浙江大学《浙大学生》编委会民国三十年九月编印。

湄潭，文、工二院留遵义，师范学院则分布两县间。湄潭东有镇曰永兴，一年级复徙居之。盖积时五载。有学院者五，而析系至二十有五，研究院者一而析部有三。其隶而附者，若工厂、农林之场、中小学，不一而足。师弟子之在校者，总三千人。其讲堂、寝室、集会、办公、操练、庖涓之所，取诸廨宇寺观与假诸第宅之美者十八九。故其材不庀而具，其功不费而集。其新筑，取苟完而已。湄潭之宿舍，遵义之实习场，皆朴而坚，简而不窳。凡为屋之数，千有余间。其有书至四部、七略，暨声光、电化、农艺、工程之著作，尚不下五万余册。其仪器以件计者，三万；机器以架计者，七百有奇；标本都二千，皆有以养其知，肄习其能……^①

这位老先生的话，文绉绉的，不好理解。他的意思是说：

国立浙江大学是在民国二十九年的春天迁徙到贵州遵义的，设有5个学院，25个系，1个研究院。此外，还有一些工厂、农场、林场和附属中、小学。文学院和工学院设在遵义，理学院和农学院设在湄潭，而师范学院则分布在遵义、湄潭两县之间。一年级的学生单独设置，先在青岩，后来又转迁到湄潭东的永兴镇。师生总数有3 000人。校舍有1 000多间，藏书有50 000多册，仪器有30 000多件，机器有700多台，标本有2 000多个。

在贵州遵义、湄潭的这段日子，是浙江大学相对稳定发展的一个时期。一直到1946年，浙江大学才迁回杭州本校。

浙江大学的西迁历程，是抗战时期我国高等教育艰难发展时期的一个缩影。漫长坎坷的求学之路上，有不少的人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中华民族的无数杰出教授和学生，在国家命运到了生死关头的时候，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保存了中国兴起不久的高等教育，并使之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不断发展。他们的壮举，并不亚于在战场上与敌人浴血奋战的士兵，他们亦将被中国人民永远铭记在心。

第二节 战时临时大学

随着日寇的疯狂推进，国民党军队在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接连遭到败绩。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沦陷。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受到严重打击，开始退出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地区。一些主要城市被放弃，文化机构损失惨重。平津等地的学生不得不纷纷逃离战火纷飞的危险。沦陷区的高等学校不得不迁往中国的西部地区。

抗日战争向着一个更广阔的地域绵延。没有人能够知道这场战争将会在什么时间停止。前线的将士们在浴血奋战，作为中国文化之脉的大学教育也绝对不能够因为战

^① 王焕镛：《国立浙江大学黔省校舍记》，《贵州文献汇刊》第5期，第108—109页，贵州省文献委员会民国三十八年一月一日编印。

争而停滞。有鉴于此，国民政府教育部为救助平津和上海、南京等战区或临近战区的失学大学生们，决定采取筹设临时大学以及允许学生借读的办法，以保证因战争而失学的大学生能够继续学业，并于1937年8月12日发布关于各校开学日期、借读、招生及维持课务等办法。

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南京、上海两市，江苏、浙江两省，以及京（南京）沪杭线各大镇市内的学校，同河北保定一带的学校，可以延期到9月20日开学。原设于北平、天津的学校的开学日期另行通令。其他区域内之学校，应按照原定日期开学^①。

教育部所颁布民国二十六年第一五六一八号训令，即《各级学校处理校务临时办法》，总计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关于开学和上课等有关事项的临时措施；二是关于救助失学学生的借读措施^②。

其中有关各校上课各事项的主要内容如下：

（1）开学日期。一般区域内的学校，按照原定日期开学，平津和经部令特别指定的区域内之学校的开学日期，由教育部“斟酌情形另令通知”。

（2）严重受到战争影响的，既可以在呈准主管教育机关之后暂行停闭或迁移，也可以在紧急情况下无须上报，“径行办理”。受战争影响不严重的地域，仍应“维持课务”，必要时可以采取短期休课的处置办法。

（3）设法收容因战事原因迁来的同等学校的借读学生，“转学不限定年级，临时借读依照临时借读办法行之”。

（4）因战争缘故和交通问题未能按时到校上课的学生，可以“酌量宽展其期限”。

（5）学生按月、学期分别缴纳学费、膳宿费。可分秋、冬两季缴纳制服费。

（6）各级学校可以在呈请主管上级后，于9—10月再行招生一次。

该文件，被教育界人士称为“抗战开始后教育部设施之第一着”^③。作为国民政府教育管理的最高行政机关，教育部清楚地看到日寇侵略战争给各级教育造成的破坏，为了维持教育的持续进行，必须制定一系列的战时教育制度，以适应战时教育的需要，尽可能将战争给各级教育造成的破坏降到最低程度，并尽可能减少学生受到的伤害，因此在开学日期、学生报到、日常上课等方面，都给出了各种变通的办法，甚至要求各级学校可以在战争严重影响到课时，各校可以自行决定采取措施，“径行办理”。因为受到战争的影响，教育部同样给予各校再次招生的机会。一是可以尽可能地吸纳学生，减少失学人数；二是尽可能地保证学校学生的数量，最大限度地利用好教育资源。教育部同样也关注到了战争引起的学生贫困问题，在膳宿费、学费、制服费等问

① 《教部决定开学日期》，《申报》上海版1937年8月13日，第4版。

② 《各级学校处理校务临时办法》，《教育研究》第20卷第3期，战时特刊第1期（总第79期），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号，第53—61页，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教育研究所编辑，国立中山大学出版部发行。

③ 同上。

题上，都要求学校尽可能关照学生的实际状况。这些措施的实施，确实缓解了战争对学校、学生的影响，并使之课业不辍，继续维持。

在同一文件中，还规定了临时借读的办法。文件要求各校，特别是公立学校尽可能接收因战事而要求借读的学生，如因校舍不能容纳，可以暂借民房或建盖临时校舍等来解决。学校如因增收临时借读学生而增加了办学费用，可以由国家或地方主管教育行政机关“酌予补助”。

1937年8月下旬，鉴于敌寇军机日益猖獗，空袭更加频繁，教育部特别指令各校注意防空，以保证学生安全。中央社1937年8月25日电曰：

近来敌机四处骚扰，教育部为谋各级学校安全起见，特电令各级学校一面力维课务，一面尽可能范围内避免相害。并限定各校于本学期部令开学期限以前，一律完成最低限度之避难设备，以防空袭，而尤应注重火灾、房屋倒塌与机关枪扫射等普通危险^①。

既要保证上课，也要保证不受伤害，所以，各级学校必须在开学之前完成防空设施的构筑。这样，即使敌机在学生上课时空袭轰炸，学生至少也有一个躲避之处，可以减少伤害。教育部还特别告诫各级学校，不仅要做好针对敌机空袭的防护，还应当注意防止轰炸造成的大火、房屋倒塌以及敌人机枪扫射的伤害。

9月2日，教育部又特令沿海沿江各省市教育厅局，对于设置在主要城市的公、私立学校，在受到敌寇的袭击时，要做好学校转移工作，“应尽力设法在比较安全的县区或乡村布置开课，并赶造防空避难设备”^②。

教育部的这些措施，无非是希望尽可能地减少对学生的伤害，但这毕竟只是权宜之计。手无寸铁的学生，在面临敌人的飞机、大炮和屠刀时，到底能否保护自己，那只有拜托上天保佑了。在战争区域不断扩大的状况下，所有学校的出路无非两条：一是转移到相对安全的乡村中开课；二是迁徙至中国西部——战争之后方——开课。因此，全国所有的学校，都被迫走上了迁徙办学之路。学生们只能离开自己的父母，离开自己的故土，离开自己亲爱的校园，远走他乡，艰难维持学业。

据教育部1939年的统计，受战争影响，迁移后方等地办学的专科以上学校有77所之多。《教育通讯》杂志曾于1938年3月记载专科以上学校战争初期的迁移情况：

战事发生后，战区或临近战区之各专科以上学校，为维持学生学业计，即迁往安全区域继续开学。计中央大学迁重庆，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合为西安临时大学迁西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合并为长沙临时大学迁长沙，现又移往昆明。杭州艺专、北平艺专合并为一校，迁湖南沅陵；武汉大学迁四川

① 《各校奉令完成避难设备》，《申报》上海版1937年8月26日，第2版。

② 《限期完成避难设备以防空袭》，《教育研究》第20卷第3期，战时特刊第1期（总第79期），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号，第55页，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教育研究所编辑，国立中山大学出版部发行。